

## 孙敏<sup>①</sup>

**[摘要]** 本文通过梳理19世纪法国关于中国的重要文学文本,发现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只呈现一种天堂与地狱的两极化倾向,诗意的想象国度与现实的帝国形象并存,由此出发探讨造成这一想象产生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化原因。

**[关键词]** 19世纪; 法国文学; 中国想象

### Imagery of (China in) French Literature of the 19<sup>th</sup> Century

Sun Min

**[Abstract]** By combing the important texts about China in French literature of the 19<sup>th</sup> century,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magination of China in this period is polarized into heaven and hell; the poetic China coexists with the fallen China, and thus explores the social,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uses that the imagination has arisen.

**[Key Words]** 19<sup>th</sup> century; French literature; Imagination of China

门多萨的《大中国帝国志》第一次以历史文本的形式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全面而完整的讲述,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。人们对中国的认识逐步从物产富足、幅员广阔、城市星罗棋布等外在的繁华景象深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、道德伦理、圣哲文化等理性层面。1687年,法王路易十四派遣5名耶稣会士到中国开展传教事业,这一举措影响深远,耶稣会士的著述成功

思想家和在“礼仪之争”中各执一端的传教士则成功地创造了一个“文化中国”,掀起对中国的制度、哲学、道德、习俗、文字、历史等前所未有的研究。

至18世纪初《中国植物志》成为中国生活诗的主要主题,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,以及传教士的兴起,不少作家将目光转向中国,将之视为新颖的文学题材,以另类题材一睹新的异类

<sup>①</sup> 作者简介:孙敏,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,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。

情调。由国口在小粉作家笔下出现。或者作为一种异国文化资源,如夏多布里昂在《其叔故

时白话,如《其叔故时(《其叔故时》)中介绍了白瓷并灯笼、琵琶、白瓷、百叶窗、瓷制的丝屏等,

雨果在描述圆明园梦幻般的奇景时,也沿用了玉石、青铜、瓷器、丝绸、彩釉珐琅等流行于 18 世纪的中国工艺品。

真正开始发掘中国的艺术价值,对中国进行诗化想象的当属泰奥菲尔·戈蒂耶 (Théophile Gautier)。早在 1830 年,戈蒂耶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这一点他在《法国青年》(*Les Jeunes de France*)中有所提及:“如果你们想知道,……为什么我渴望获得金钱,我西生告诉你们……为了购买日本的土著画和中国的瓷土。”<sup>[1]</sup>1835 年他更是写下了《中国情

恨短,故国情,清人供出这些意象组合起,一种唯美浪漫,既与雨果的《其叔故时》“梦幻 故”,其中的“瓷屏”与象牙雕花瓶,给他在其中对“古铜器或骨雕或贝壳,而成为其武器时 故农生活。这与诗人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理念不谋而合。与当时,“中国”还成为一种在经 常阅读使法,精致,奇幻,好奇,绝美。它体现的是与西方传统审美观念不同的独特风格。

此后,戈蒂耶的游记进一步与中国有关的作品,如作于 1837 年《其叔故时》( *Monoguerie* ) 也多次提及中国,并以此为契机,结合其个人对中国的不了解,创造出一种 独特的审美,远离日常世俗形态的中国形象。《水榭》(*Le Pavillon sur l'eau*) 则讲述了年轻的 诗人与少女相互爱慕,以诗使懂其心事,以诗使这一种全新的情感模式与创作方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戈蒂耶对中国的情爱吸引了身边的一批作家,如福美拜、尚古尔兄弟、路易·勃吕,波德莱尔等都曾是其家中的常客。1861 年戈蒂耶为其女朱迪特 (Judith Gautier) 取诗名曰丁,其诗名亦在彼得,这在当时就已引起轰动。丁被诗作为母亲的灵魂 符号,成功地激发起一批法国作家对中国的兴趣,在龚古尔兄弟的日记中就专门记录了与丁 一起共进晚餐的情形。更重要的是,朱迪特在丁敦翰的帮助下,用法文翻译了中国古典诗词 并于 1835 年出版,取名为《五书》(*Les Cinquiesmes*)。法文版

“寂寞”“月”“枫”“恨”“恨人”“恨”“恨”“恨”,白旗时,每一页就必有中文题词,如“爱 惜”“爱”“爱会”“爱叶”“爱水”,“月”“爱”“爱月”“爱恨”“爱”。就翻译本身而言,《五书》是不忠实的。朱 迪特以一种莫名其妙的、散文化的形式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了富有个人特色的改写,但保留了 大量中国诗词原有的意象,并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浪漫气息,吸引了不少法国作家。

这一唯美、诗意的中国形象在随后的作品中不断重复,如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《墨迹》 (*Dreams Imaginés*)、戏剧《天女》(*Le Fille de Ciel*) 等都是历史上第一部,其创作灵感来自 一个法国画家画出的中国真像。但作家所表达的对中国不真实多少真实性,越重要的是因史 实缺乏而完全地想象其想象世界。她,或者为“中国”一词,或者为“中国”一词,或者 抗拒到玩味的中国旅行。她不对中国作玩味的追问,而是行共供奉了古典的、永恒的关之神

坛上,其本质就是以诗化的中国来对抗庸常的社会现实。

在她的影响下,帕尔纳斯派诗人(Parnasse)及其后诗人笔下的中国都是瑰丽崇高的象征。

痛苦挣扎的油灯陈旧的责难,/模仿心灵澄澈细腻的中国入/他醉心于在狂喜的月下/在雪白的茶杯上,静心描绘那朵/奇花的终岁,香泽他一生/透明的,她的芳馨,孩提时,/渗入他灵魂的青色花纹。/怀着智者唯一的梦死去,/泰然,我将选择一片年轻的风景/我还会漫不经心,在茶杯上绘制。/一条纤细苍白的蓝色线条将是/一条弧线,去表达你遗憾的

符、幻术、催眠,正是诗人追求的永恒之美,正是诗人在这个空间里

从没有自由,将在不在你体内,对诗人的想象都有种对现实的超越。诗人的想象

作家的想象力提升为认识真理世界的的能力,借以反抗自然主义的创作理念。象征主义以“想象”对抗“现实的摹写”,以想象力的真理性对抗所谓的“客观真实”。马拉美曾以“说一朵花”为例,说明他的诗学追求。他所写的不是众所周知的花,而是“在所有的花都不在的情况下”绽放的众花之花,是奇妙的思想之花,抽象之花。换言之,文学要表现的不是具体的物象,而是理想的物象、物象的本质。这就如同要表现一朵理想的花,就不能只描绘某一种花的形

法国诗人以“虚构”的力量在作品中渲染出一个美妙奇幻的中国,这里才子佳人遍地,人人把酒吟诗,过着诗一般的生活。中国在诗人们笔下就是世俗的“对立物”,是一个离现实要多遥远就多遥远的地方。

当然,这种对中国的诗化想象,除了自身的诗学追求之外,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。

一方面,它延续了17、18世纪法国对中国的想象,并在重复的想象中建构起

的文学想象。18世纪,法国作家伏尔泰、狄德罗、孟德斯鸠等人都曾将中国引入其作品,如伏尔泰《波斯人信札》、狄德罗《百科全书》、孟德斯鸠《论法的精神》等。此外,一些法国作家还翻译过一些中国小说,如《平山冷燕》《玉娇梨》。1862年,路易·布瓦索翻译了《红楼梦》。

这种对中国的想象,在19世纪法国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。法国作家雨果、大仲马、小仲马等人都曾在作品中提到中国,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法国人的想象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对中国的想象在不断的重复中不可避免地趋于刻板。这一方面,安徒生在中国的一首诗便入骨铭心:“衣服分给又穿得,不造费思又织就,……织得

大小。——这种想象日益成为人们关于中国的主要想象,与借住的乃是一种自足中国的

冲动合谋。

我们不能忽视 1840 年以来,法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和民族优越感逐渐增强带来的影响。早在 1838 年约瑟夫·梅里就预言了东方的西化,东方在其叙事框架中成为西方的对立面。梅里的小说《法国人与中国人》(*Les Français et les Chinois*)以欧洲殖民者与中国贫民在广州街头的冲突为开端。中国人在小说中变成暴力与仇恨的化身,欧洲人往往不得不对恶意的挑衅,自我防卫。更重要的是,以往对中国的追慕与向往,在小说中变成了中国的贵妇人对英国军官的迷恋,隐含其中的白人优越感和膨胀的自信心不言而喻。

志惨的工作状态,还有工人们围着抽奖的转盘,物欲横流的百文酒,直捣到酣醉的人群的狂欢

狂欢。日志以一种隐而不显的笔调呈现出所谓“真实”的、衰败的中国,为殖民征服张目。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,对中国的梦幻想象遭遇更严峻的挑战。这一时期,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势力日益扩大,中国的国门也逐渐向法国敞开。很多作家得到中国游历,在他们的视野里,中国自然而然地被分裂为两个世界,一是古老的、诗意的中国,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积淀,是难以复制的神秘文明;二是现实的、落后的中国,贫穷、苦难、暴力、愚昧等种种现代文明的否定因素交杂在一起,中国俨然就近难以忍受的人间地狱。不少精英知识分子对中国将表现在在价值于欣赏、鄙薄与感其、鄙斥几平情感状态之间。

19 世纪末最有名的异域作家洛蒂(Jules Verne)曾作为“大仲马联军”随法团军官,两次出征北京,镇压义和团运动,还曾领军进入紫禁城,在这座昔日神秘、宏伟的宫阙里游玩。他在私人日记(*Journal Intime*)和北京日记集《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》里记载了他对十国之行与在皇城的体验。不同寻常地,他对中国的描述带有某种征服者的傲慢或鄙夷的下的姿态。作为征服者,他看到的是充斥着灾难、战争、仇恨的中国,到处是废墟、尸体、荒凉的田地和贫民求生的惨状。不过,这并不妨碍他在北京寻找乐趣,在被破坏不堪三座佛塔在废墟。他笔下的中国则像是一种说不尽的哀怨与仇恨,从而点燃了中法民族仇恨与殖民主义魔焰。另一方面,他坦承对“中国魔窟”发挥到极致,感觉不自觉地捕捉中国更异的古董、古玩、冠帽,迷恋于搜寻宫里与众不同的风物。《私人日记》中就记载了他如何巧妙地让“魔窟的皇子们”成为他的俘虏。

另一位曾实地去过的香港总督官员有双重身份,既是老年领事与作家。作为领事,他通过日记与著作《香港》(1860)来描述香港,他的研究为后世的香港与通商口岸提供了自己的精神家园。他在《认识东方》(*La Connaissance de l'Est*)中借由园林、寺庙、寺庙、宫殿与宫殿等建筑空间,来展示一个文明,它的基本元素,是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如世界。

如果说,19 世纪末期法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尚能在对中国如暗夜的现实中被土“土”的暴政与

理想化的色彩,那么在大众与通俗文学的想象中,中国则被塑造成一个“地狱”。在他们笔下,中国人粗鲁、狡诈、虚伪、无知,终日沉溺于吃喝玩乐。早在 1872 年于连·凡尔纳(Jules Verne)的著名小说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(*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-vingts jours*)里,中国人便以窃贼的反面形象出现。1879 年,凡尔纳更是以《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》(*Tribulations d'un Chinois en Chine*)为题,讲述了一个欧化的中国人于金福(W. — K. F.)

假定的文明……它的一切精致之处都最终走向极度的自私自利和毫无节制的残酷”<sup>[4]</sup>。所以,小说的女主角“芦花”公主最终因皈依基督教,获得了法国军官的爱情。

我们可以看到,19 世纪法国文学想象里的中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中国:一是诗意的艺

大众想象,在将千百种情、丑化的过程中,以文为信用的三死族等,为法国的殖民征服提供合法的依据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Théophile Gautier. *Le Bol de Punch*. 1833.
- [2] Théophile Gautier. *Poésies diverse*. Larousse, 1929.
- [3] 涂卫群. 文汇读书周报, 2003-7-7.
- [4] 米丽耶·德特利. 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[M]//孟华. 比较文学形象学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1: 246, 255.